

郭沫若研究论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李文金

郭沫若研究论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1/32 印张11 插页4 字数227千

1980年6月第一版 198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书号：10118·247

定价：1.17 元

编者的话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至十九日，在郭沫若同志的故乡乐山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以纪念郭沫若同志逝世一周年。

我们从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数十篇论文中选出十七篇（附录会议侧记一篇）经作者修改后，编成这本集子，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个成果向全国人民和学术界汇报，以期把郭沫若研究推进一步，引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来。

今后，我们还将陆续编辑出版郭沫若研究论文集，请同志们不吝赐教赐稿。

编者

1979年8月

目 录

光辉的一生 深切的怀念

-王廷芳 (1)
回忆父亲.....郭庶英 郭平英 (16)
郭沫若——永远不灭的光辉.....孙席珍 (28)
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研究中的
 几个问题.....陈永志 (53)
郭沫若泛神论思想探源.....李保均 (72)
郭沫若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王锦厚 伍加伦 (92)

八千里路赴云旗

- 读郭沫若同志《归国杂吟》及其他
.....华忱之 (122)
重读《女神》的几点体会.....高 兰 (135)
《女神》的爱国主义精神.....李昌陟 (158)

论郭沫若早期的浪漫主义诗歌主张

.....孙玉石 (168)

读郭沫若论诗的一封信.....尹在勤 (196)

论郭沫若的历史剧.....陈瘦竹 (203)

郭沫若历史剧试论.....黄侯兴 (221)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战斗性和真实性

.....王大敏 (258)

论郭沫若历史剧中光辉的妇女形象

.....谭洛非 陆文璧 (282)

谈郭沫若与外国文学的问题.....戈宝权 (299)

郭沫若与外国文学.....龚翰熊 (323)

凌云山上的盛会

——郭沫若研究学术讨论会侧记

.....邱沛篁 (341)

王廷芳

光辉的一生 深切的怀念

去年的今天，敬爱的郭老离开了我们；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家乡召开这样一个关于研究郭老的学术会议，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对郭老的学术研究，在他生前和逝世后，各研究机构和大学已经进行了一些工作；但是，全国的学术研究工作者，聚会一堂，把研究成果，集中起来，进行讨论，这还是第一次。这对于进一步研究郭老，对于郭老著作的出版，都会起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同时，利用这个机会，我们还可以去参观郭老诞生和青少年时代学习、生活的地方，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对于郭老生平著作没有什么研究，我是来向大家请教，向大家学习的。自己在郭老身边工作二十多年，现在我把自己了解的一些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郭老在一九三九年，曾三次回乐山和沙湾。三九年春天第一次回到乐山，时间很短。一九一三年去日本前回过一次沙湾，直到这时才又回家乡。这年夏天，父亲去逝，他同于立群同志一起又回到沙湾；郭老在家停留一段时间后又回重

庆，于立群同志就留在沙湾；不久，郭老又来沙湾，办理父亲丧事。此后，直到他逝世，就再也没能回来了。但他经常怀念自己的家乡。他经常向我们讲家乡乐山的情况，讲乐山的凌云山，大佛寺，乌尤寺，沙湾，大渡河，茶溪。郭老到了晚年对故乡就更加怀念，怀念故乡的乡亲们，很想回来看看。六六年四月中旬，郭老、于立群同志，我们一起都到了成都，就是准备回乐山和沙湾的。当时西南局和省委领导同志说，郭老回来一次不容易，希望他多在四川停留一段时间，看看四川的建设，也看看他的家乡和青少年时代生活和学习的地方。这样，我们就先去了西昌和渡口。这年的五一节是在成都过的，过了节就准备回乐山。什么都准备好了，就在这时，北京来了电话，说有紧急事情，需要回去。回北京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以后就再没有机会回来了。但是，他时刻想念着自己的家乡，特别一九七四年他生病以后，曾多次讲，等他身体好一些的时候，一定要回家乡看看，回来看看沙湾，看看沙湾的亲人们。……

这次，自己能到郭老的家乡来，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也是对郭老的很好的纪念。

现在，我把了解到的关于郭老的一些情况讲一讲；自传中讲到的内容，我就不讲或少讲。

郭老在日本留学时，从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期间，就较早地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并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到了一九二四年，他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列主义，并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他从此“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答

青年问》，载《文学知识》一九五九年六月号）。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他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转化和发展，从宣传革命而投身到革命的实践斗争中去；他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高潮中，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在这段时间，他结识了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并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所接触和交往。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那一天，郭老离开上海，经海路到了广州；他是应林伯渠同志之约去的。到广州后，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去广州的还有郁达夫等人。

据我们所知，这段时间，郭老与毛主席会见过四次。

他三月二十三日到广州，成仿吾迎接了他，给他安排了住处；然后他就去拜会林伯渠同志，但林老不在家。刚到林老家不久，毛主席就来了，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当时广东比较乱，发生了中山舰事件。毛主席很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广东和全国的革命运动的情况；接着林老回来了，毛主席又和林老简单地谈了几句，就走了，这是毛主席和郭老的第一次会见。

在此期间，毛主席曾邀请郭老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做过一次报告。在报告之前，毛主席亲自到郭老家里去洽谈，向他发出邀请。作报告时，毛主席又亲自陪同着他。这是他们第二次和第三次见面。

当时广东有个东山青年会，请了三个人讲演，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郭老，还有一个是东京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马伯援。原排列讲演的顺序是，郭老，毛主席，最后一个是

马伯援。但马伯援耍了个滑头，他说他有事，要先讲，否则就讲不成了。他便先上台。他在讲话中对马列主义进行了肆意的诋毁，然后扬长而去。郭老接着便登上台，痛斥和批驳了马的谬论；这是郭老第四次同毛主席在一起。

郭老同周总理也是在广州认识的。郭老是三月底到的广东大学；四、五月间周总理去广东大学讲演，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郭老参加北伐，主要还是周总理的影响和鼓励的结果。

当时革命的中心是广州。很多文学艺术家和文艺爱好者都到了广州。据阳翰笙同志回忆，有一次他和李一氓对郭老说：北伐军快要出发了，郭先生，我们一起参加北伐吧！郭老当即表示同意。那时，阳、李二位已是党员，郭老还不是。阳、李就向总理报告了这个情况，总理对这件事很重视，说郭老如能参加北伐，政治影响将是很大的。总理即约郭老到自己家里来，两个谈的很投机，很高兴。于是就决定让郭老的好朋友孙炳文同志出面向蒋介石和邓演达推荐郭老到北伐军政治部工作，担任北伐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这是一个很有实权，也很重要的职务，宣传工作是政治部主要任务之一。当时蒋介石已开始排共，不愿意让共产党员担任这个职务，但国民党里面也没有人有能力可以胜任此职；郭老任此职，他们也还通得过。炳文当时向郭老讲，这个职务虽低，但作用很大；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多做工作，而不空图虚名。郭老表示，只要有工作干，职务高低，他是不在乎的。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他当时地位很高，名气很大。为郭老担任此职，政治部还召开了一次类似政治部部务会议的会，周总

理亲自参加了这个会，在会上称誉郭老的才干，强调他能胜任此职；总理的用意是怕邓演达不尊重郭老。

据郭老自己回忆，他参加了北伐军，在广州只停了十天左右，就出发了。出发前，军装一直未发下来，所以他当时已身为军人，而穿的却是大长袍。他七月间随北伐军从广州出发，九月间到达武昌城下，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他就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而升到政治部副主任；军衔也由中校晋升为中将。

从广州出发后，李一氓同志一直和郭老在一起，做他的秘书；当时北伐军政治部党的负责人是聂荣臻同志，他们也是经常在一起的。

郭老生前对我讲，当时林老约他去广州，这是林个人的意思呢，还是党组织的意思？郭老晚年认为，他的去广州，是党组织的安排。陈抱隐先生曾告诉郭老，此事是瞿秋白同志推荐的。据阳翰笙同志说，郭老去广州，是秋白同志的推荐，由组织上安排的，虽然细节不知道，但这两点是没有问题的。

另一个问题是，他到广州的当天就见到了毛主席；郭老也认为这可能是有意的安排，而不会是巧合和不期而遇。郭老晚年说，只是估计如此，因这些老人都不在了，没法证实。

现在讲一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的一些情况。郭老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朱老总家里写的。这篇文章写在“四·一二”的前十几天，他以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并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政

治面貌。他还写有另一篇文章，名叫《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是四月一日写的，现在还没有找到，希望研究者们能找一找这篇文章。当时，在“四·一二”以前，虽然蒋介石已经开始镇压革命了，如九江事件、安庆事件等等，但他本人还伪装革命，他的反革命面貌是在“四·一二”事件中才完全暴露出来的。郭老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及时揭露了蒋介石的真实的反革命本来面目，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郭老写了这篇文章后，打扮成绅士模样，四月十四日到了上海，第一站先到内山书店，即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家里。当天李一氓同志乘汽车将郭老接到了他的家里。当晚在李一氓处，郭老见到了总理。总理把上海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郭老主张到武汉方面去组织力量，打倒蒋介石。总理觉得郭老的这个意见很好，当晚就把他送到另一个住处。四月十五日离开上海，坐了一艘外国的轮船，经过南京时，南北两岸正隔着长江在交火。船便在江心停了四、五天，然后到了武汉。郭老在“四·一二”前后虽然不是党员，但他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总理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的。他当时对总理就特别敬佩和尊重。

关于郭老参加南昌起义问题。了解这一段经历，对我们研究和认识郭老也是很重要的。“八一”起义的当天，郭老并不在南昌。当时他在九江，南昌与九江之间已经封锁，郭老冒着生命危险，赶到南昌去参加起义队伍。他在去南昌途中，曾受到散兵的袭击，几乎丢了性命。

他是八月四号晚上赶到南昌的。五号，就随起义军离开了南昌，经临川、瑞金、汀州，到达汕头。他当时的职务是

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就在这次行军途中，由总理和李一氓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到达汕头地区不久，战斗失利，郭老即乘一只渔船到了香港，再回到上海。

郭老参加南昌起义后，蒋介石对他下了通缉令。何时回到上海？他在文章中写了几个时间，准确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中旬。我曾问过郭老，郭老说这个时间比较可靠。

回上海后，他很快同总理取得了联系。起初是决定他到苏联去。当时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很紧张，苏联领事馆要全部撤回。郭老准备乘苏联撤回领事馆的轮船去苏联，但由于突然患斑疹伤寒，未能成行。

郭老在《离沪之前》一文中（见《沫若文集》第八卷第257页至258页），有几处提到总理，很重要，我摘引几段：正月十九日日记中写道：“中午将近时，民治（按：即李一氓同志）来，交来豪兄（按：即周恩来同志）答函”（《沫若文集》第八卷第261页），说明在这以前，他们就已经有了联系。二月九日日记中又说：“定十一号走（按：即去日本，然后去苏联）。……豪兄不来，一时也不能动身。恐怕十一号不一定能够走成。”（《沫若文集》第八卷第276页）就是说，走以前，一定要见到周恩来同志，否则，就走不成。说明他之去日本，是在总理指示下安排的。二月十日总理来了。这天的日记中写道：“豪和民治来，同吃中饭。仿吾亦来，约了初梨等来谈话。”（《沫若文集》第八卷第276页）显然，这次会见很重要，他是在同周恩来同志会见谈话之后，才去日本的。郭老曾对我说：总理要资助他一部分钱，他坚决不

要，说组织上现在也很困难；创造社可以在经济上给他一些接济。从这些事实来看，郭老是在总理的嘱托和安排下去的日本。

郭老到日本去，本来是打算经日本去苏联的。但到日本后不久，即被日本警察发现并扣押；虽然几天后即被释放。但从此，他就处在日本警察和宪兵的双重严密监视之下，因而去苏联是根本不可能了。从一九二八年春到一九三七年夏，他在日本东京的郊区千叶县市川市须和田这个地方度过了十个年头。这十年中他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同国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积极支持了国内文化界的革命文化活动，他还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和文艺作品。

再谈谈郭老是怎样从日本回来的。

郭老经常和我讲：他在日本十年，就好象是住在一个大的监狱里，他的行动受着警察和宪兵的双重监视。他随时都在密切注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国内发生了什么事变时更使他坐卧不安，焦虑难忍。他多么怀念自己的祖国啊！多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是蒋介石的通缉，日本警察宪兵的监视，使他有翅不能飞，有国不能归。

泸沟桥事变以后，郭老之所以能从日本回国，是利用了一个矛盾。我们知道，郭老在日本时，对甲骨、金文的研究颇有建树。当时日本政界有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名叫西园寺公望，是元老，说话影响很大，但政治上比较保守，他对郭老的古文字学研究著作很有兴趣，十分赞赏，认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搞出这样的成绩，很不容易。日本报纸就把这

个消息当作新闻报导了；国民党也乘机大肆宣扬这个消息。他们大肆宣扬此事，是为了诋毁郭老，想证明，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搞到一起去了，当了汉奸了。这件事，不久也就过去了。但到了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如张群、何应钦之流，想同日本拉关系，他们便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便设法请郭老回国。这样，国民党才在“七七”事变后，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同志们也希望他能早日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郭老就毅然冒着生命的危险，躲过警察和宪兵的监视，抛妻别子秘密地回到了祖国。具体帮助郭老回国的是画家钱瘦铁和金祖同二人。钱瘦铁当时在日本有点地位，公开活动不方便；金祖同也搞点文字学研究，和郭老平常有来往，帮了不少忙；是他具体安排和陪同郭老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郭安娜当时对郭老的回国也是完全支持的，而且帮了很大的忙，这一点郭老生前不止一次讲过，也不止一次写过。

回国后，郭老就一直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解放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我就不多讲了。

下面再讲讲批林批孔中“四人帮”是如何迫害郭老的。

当时，“四人帮”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知道，郭老从大革命起就同总理关系很密切，很好；他们就想从郭老身上开刀，达到他们攻击总理的目的。因此他们就把郭老看作斗争对象之一。两校大批判组把郭老

的著作，作了摘录翻印，发下去，再由下面反复翻印，打算大规模地对郭老展开批判；这件事被毛主席发现后制止了。毛主席指出，不能批判郭老。但“四人帮”不听，仍然在“一·二五”一万八千人大会上，点了郭老的名；当时总理也在场，他们的矛头是针对总理的。毛主席说不能批，他们还是要批，他们的矛头也是针对毛主席的。在这个大会上，把郭老喊起来，站着，这对郭老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原来他们要批郭老，还是少数人知道，现在他们在大会上点名，就在社会上公开了。

在这次大会的前后，总理曾经两次到家里去看郭老。总理都是说，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他自己也要研究研究郭老的著作。总理说，他没有发言权，因为他没有读书，读了书才有发言权。总理还对我、对郭老的子女们说，咱们大家都要读书，读了书才有发言权，要不，就没有发言权。

张春桥在“一·二五”大会以后也来了一次。他张牙舞爪地指责、批评郭老抗战时骂了秦始皇。郭老针锋相对地说：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把张春桥顶了回去。但“四人帮”并不甘心，他们组织了大量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郭老。

在“一·二五”大会后的当天晚上，总理派人来，指示说：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而且具体地指示了四条：第一条是，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条，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小的卧室中搬到大房子里去住。后来总理

见到郭老时，对郭老说，为什么让你从小房子搬出来呢？因为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条，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条，具体工作，由我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我负责。我听了总理的指示，感动得不得了。郭老听了总理的指示，也感动得连连说了几声“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郭老，但万恶的“四人帮”却对郭老进一步地进行折磨和迫害。叛徒江青，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号的下午找上门来，纠缠和折磨郭老，她逼郭老写检查，写批宰相的文章，还以批安东尼奥尼《中国》为名，指桑骂槐地影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她在郭老家中东拉西扯地纠缠了两三个小时，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才走。郭老当时咳声不断，很少和她答话。当天晚上，郭老就病了，开始发烧。我们马上把医生请到家里来。大夫给他打了针，但烧仍旧不退，反而继续升高。我们就建议他住院。他这时已经脱衣就寝，说：明天再去吧，这么晚了，太麻烦了。大夫说，那可不行。我们便把他抬上救护车，让他住了院。他这时温度已经从三十八度升到三十九度多，烧得迷糊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郭老的生命到了危险的边缘。

我们敬爱的总理，每天几次过问郭老的病情，经常派他的医生到医院看望，并亲自指挥抢救。在这种情况下，郭老被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了。但从这次发高烧以后，种下了肺炎的病根，在此以前郭老是没有得过肺炎的。这以后，肺炎就反复发作。又经过了几次危险，都闯过来了，这说明，郭老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这年七月份，郭老又经历了一次危险，因打针过敏，烧到四十度，几乎要休克了。这是第二次危险。总理知道后，每天要过问好多次，组织人员抢救；为此，总理还亲自指示说：对老年体弱的病人，用新药要慎重。必要的时候，事先要做试验。

第三次危险发生在总理逝世以后。总理的逝世，对郭老影响特别大。郭老当时住在医院里，经常挂念着总理，从照片上看见总理瘦了他就特别难过，总理不接见外宾了，他就更加不安。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他听后当时就不会动了，心情极其悲痛，木然地坐在那里，象傻了一样。他对我说：我一定要去向总理的遗体告别；总理的追悼会，我一定要参加。这之后，他又经历了一次危险，这次病发作得比较厉害，但仍然抢救过来了。

总理这样关怀、爱护郭老，郭老也是非常尊敬爱戴总理。总理逝世后，我们在郭老面前，谁也不敢提起总理；一提大家都哭起来。总理的逝世，的确对郭老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郭老非常兴奋，他说，我们又得到了一次解放！他的精神完全两样了，和前几天比较，简直判若两人。他说，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是为党除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并奋笔疾书，写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他当时身体仍很不好，住在医院里。他抱病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在天安门城楼连续站了两个小时。我们和大夫都觉得这是奇迹，简直不可想